

西汉太一九宫式盘占法及相关问题

孙基然

关键词：《灵枢·九宫八风》 西汉汝阴侯墓 太一九宫式盘 占测方法

KEYWORDS: The *Jiugong Bafeng* (Nine Palaces and Eight Winds) Chapter of the *Lingshu* (Spiritual Pivot) Part of *Huangdi Neijing* the Tomb of Marquis of Ruyin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aiyi Jiugong* (Supreme Unity in Nine Palaces) *Shipan* (Cosmic Board) Divination Methods

ABSTRACT: From the inscriptions about the divination results and subjects on the *shipan* (cosmic board) in *Taiyi* (Supreme unity) *jiugong* ([in] nine palaces) format, which was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Marquis of Ruyin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ith the reference of the contents related to “*Taiyi zhan* (Taiyi divination)” and “*Wu gong zhan* (five-palace divination)” mentioned in the *Jiugong Bafeng* (Nine palaces and eight winds) Chapter of the *Lingshu* (Spiritual pivot) part of *Huangdi Neijing*, and based on the distinguishing of the two concrete divination methods and their essential differences, the making process of the graduation of the circular board of this *Taiyi jiugong* cosmic board could be restored. The key of judging the right or wrong using method of the cosmic board is that all of the subjects in the divination process could be reasonably attested, which could correct the mistakes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made i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using of the *Taiyi jiugong* cosmic board. The “*baixing* (lit. all of the surnames)” mentioned in the inscription of this *Taiyi jiugong* cosmic board very likely meant “*baiguan* (all of the officials)” ; meanwhile, the term “*li*吏 (attendants or clerks)” might have come from the religious tradition of “*li*犁 (plow)” of the Deity of the Soil, but it might also have the metaphor of “*limin* (the common peopl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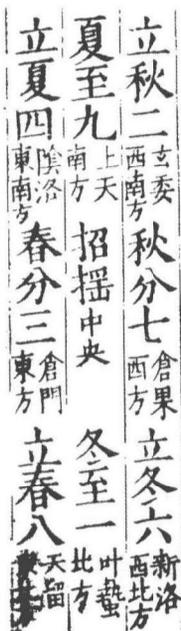
《灵枢·九宫八风》这篇古老的文献，曾被视为后人的伪作^[1]。随着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太一九宫式盘（以下简称式盘）的出土^[2]，这种疑惑不仅不攻自破，而且与式盘相关的若干学术问题^[3]也得以廓清。但是，对式盘占法早期形态的研究，由于史料匮乏，目前仍属尚待开拓的领域。我们认为，式盘占法的早期形态，可以通过式盘与《灵枢·九宫八风》相比较的办法得以解决；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判明，迄今为止有关

式盘使用方法的研究中存在重大疏漏。兹就相关问题略加梳理，以供研考。

一、式盘使用方法研究概况

综观以往有关式盘使用方法的研究状况，可知其最大分歧主要在于“太一下中宫”时，圆盘旋至何位不明。有学者提出，第五日五宫的表示当仍以一宫为准^[4]。然而，这种以一宫代替五宫的办法，不仅得不到任何证据的支持，而且又增添了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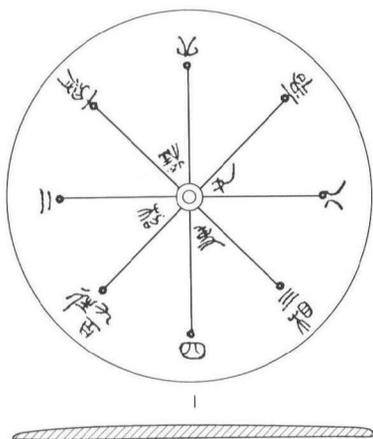
作者：孙基然（Son Kizen），日本高梁市，716-8508，吉备国际大学社会科学系。



图一 《灵枢》九宫八风洛书图
(采自《黄帝内经灵枢》影宋本第369页，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年)

宫相撞的新矛盾，显然理屈。或者认为，“一君”与“八”之间近中心位置针刻有“中央”二字的合书^[5]，这很显然是受到了《灵枢》九宫八风图（图一）“中央招摇”的影响。还有人认为“一君”与“八”之间近中心位置针刻有“五”字^[6]，在此基础上提出，每日旋转上盘，五即按上盘该字刻的位置^[7]。这些观点似乎解决了第五宫位置的确定，但事实上是苦于找不到第五日五宫的定位点，而将圆盘的“也”误认作“中央”或“五”所致^[8]（图二）。

鉴于以上误判，又有学者根据“吏”字位于“三、四”和“圆心”之间这一事实，提出圆盘上的四个字，应该读作“吏，招摇也”；而第五日时，应将圆盘上刻有“吏”字的位置，对准方盘上的某个方位及时辰^[9]。至此，式盘使用方法似乎得以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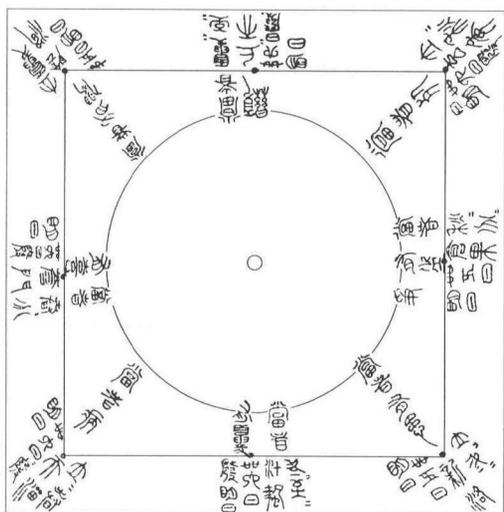


图二 西汉太一圆盘
(采自《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决，但问题的关键是，判断式盘使用方法正确与否，必须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毋庸置疑，检验、判断式盘使用方法的标准就是式盘的具体占法。

二、式盘占法的问题

严格说来，式盘的使用方法与式盘占法，虽然有密切的关系，但两者并不能等量齐观。式盘的使用方法前文略有述及（论详后说），它仅仅表明式盘的旋转程序是按着圆盘上的洛书运行，其中“五”及“废”日即按圆盘刻有“吏”字的位置而已。而式盘占法是指在式盘使用方法的前提下，根据不同的占测对象，给出相应的占验结果。那么，针对不同的占测对象，又是如何做出相应的占测结果呢？目前可供探讨的资料似乎也仅有式盘和《灵枢·九宫八风》。式盘的圆盘虽然没有所谓占测结果的记载，但被占测的对象包括了“君”、“相”、“将”、“百姓”、“吏”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且方盘的八方又恰好刻有与所谓占测结果相关的铭文。无独有偶，《灵枢·九宫八风》虽然没有像式盘的方盘中诸如所谓“当者喜”之类与占测结果相关的内容，但是对占法却有明确提示，如“太一在冬至之日有变，占在君”等即是。文献与考古遗物互相参补，无疑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疑问是，两者的所谓“五宫占”名称虽然吻合，而且《灵枢·九宫八风》对具体占法亦有提示，但从式盘来看，其占测的结果却是落在方盘上的八节，那么“五宫占”是如何与八条占验结果相联系的呢？为了能使讨论的问题明确化，以下先以“太一在冬至之日有变，占在君”为例略加演示。首先将圆盘的“一”对准汁蛰宫，此时圆盘的“君”正对方盘的冬至（一）。此日气候若有突变，可断其君运为“当者有忧”（图三）。可是在将圆盘上的“二”对准方盘上的“冬至”时，圆盘上的“君”却与方盘上的“立夏”（四）相合。



图三 西漢九宮方盤正面

(采自《阜陽双古堆西漢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从《灵枢·九宫八风》的洛书图来看(参见图一)，“立夏”并不与洛书“二”、而是与“四”对应。同样，将圆盘上的“三”对准方盘上的“冬至”时，圆盘上的“君”却不与方盘上的“春分”(三)重叠，而与方盘上的“秋分”(七)相合。以下除了“五”以外，由“四”至“八”被占者按圆

盘洛书旋转时，皆与方盘洛书排列规则呈左右互逆的形式。很显然，我们既不能如此占验。更不能以实际观测时九宫在天上、观测者在其下，而式盘与观测者的位置关系是观测者在圆盘、方盘之上，两者恰好相反来解释。因为不仅在圆盘的“一”对准方盘汁蛭宫时，两者的洛书排列是吻合无间的，而且当圆盘的“九”对准方盘汁蛭宫时，圆盘上的“君”也恰好与方盘上洛书的“九”重叠。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种左右(或上下)互逆的情形，不啻“君”运如此，而且诸如“相”、“将”、“百姓”之运，无不呈现出完全相同的现象(表一)。这似乎在提示我们，迄今为止，有关式盘使用方法的研究中，或有重大疏漏。

三、式盘占法再考

从表二来看，“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蛭之宫46日”中，“一君”转至叶(汁)蛭宫的日数是五天。学者或以为，太一在冬至46日中，占验“君”运只在这五天里进行^[10]，似非如此。假如“一君”只在这五天里进行

表一 太一居四正宫时圆盘刻度与方盘洛书关系表

太一在四正宫	圆盘被占测者	方盘洛书								
		1	2	3	4	5	6	7	8	9
太一在冬至	按圆盘洛书旋转时(以下省)，君位(一)在方盘洛书的位置	1	4	7	2	2-7	8	3	6	9
太一在夏至	百姓(九)在方盘洛书的位置	1	4	7	2	2-7	8	3	6	9
太一在春分	相位(三)在方盘洛书的位置	9	6	3	8	3-8	2	7	4	1
太一在秋分	将位(七)在方盘洛书的位置	9	6	3	8	3-8	2	7	4	1

说明：太一在冬至、夏至时，以上下(南北)为轴，一君和九百姓与方盘洛书完全吻合，其他皆呈左右互逆。太一在春分、秋分时，以左右(东西)为轴，三相和七将与方盘洛书完全吻合，其他皆呈上下互逆。

表二 太一以冬至之日居叶(汁)蛭宫46日表

周·日	第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一周	一·转至叶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三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四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五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五·...

说明：“...”为“转至叶蛭”之省。阴影部分为八节首日。第5日和第46日的“五...”，相当于式盘刻有“吏”字(中宫替身)的位置。

的话，那么剩余的时间里又用来做什么呢？最关键的是，式盘明确提示，不占验者只有“废”日，其他时日气候若有突变，必须有所占验才趋于合理。我们以为，要想解决以上诸多疑惑，应该转换视角，可做如下考察。

事实上，九宫在天上，按照郑玄记载的方法^[11]，古人是想像“太一”依洛书之序巡行，后来又将这种想像以式盘的形式来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所谓圆盘就是“太一”的化身。九宫既然在天上，观测者就应该仰望星空才合理。准此，第一，必须按着“太一、九宫、观测者”这样的顺序排列。换言之，应该把圆盘、方盘举过头顶。但必须注意的是，由于观测者仰望星空，故圆盘的刻度面应该朝下^[12]。这一点没有人注意到，应为破解式盘占法的关键之一。第二，应将九宫方盘置于圆盘之下。但必须注意到观测者虽然是仰望星空，九宫的方位却是不变的，所以不能把九宫的正面朝下，而应该是面对九宫方盘的背面。当然为防止误判，最好是把九宫方盘想像为透明的，并将“一”对准北方，“三”对准东方。此为破解式盘占法的另一关键步骤。第三，观测者应位于方盘之下。以下我们仍以“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46日”为例进行演示。首先将圆盘上的“一”对准九宫方盘上的“冬至”，根据“太一在冬至之日有变，占在君”，此日气候若有突变，可断其君运为“当者有忧”（参见图三）。其次将圆盘上的“二”对准方盘上的“冬至”，此时圆盘上的“君”恰好与方盘上的“立秋”（二）相合，此日气候若有突变，可断其君运为“当者死”。再将圆盘上的“三”对准方盘上的“冬至”，此时圆盘上的“君”恰好与方盘上的“春分”（三）相合，此日气候若有突变，可断其君运为“当者有喜”。以下不赘。从演示结果可以看出，在按一至九之序旋转圆盘时，“君”的巡行路线恰好与九宫方盘“洛书”之序叠合。应该说明的是，

如果没有《灵枢·九宫八风》中“太一在冬至之日有变，占在君”这段话，恐怕我们还是无法复原这久已失传的早期占法。那么，“（太一）明日居仓门46日”时，应该如何占验呢？以下再略作说明。首先将圆盘“一”对准方盘九宫上的“春分”，由于“太一在春分之日有变，占在相”，此日气候若有突变，必须找到“相”的位置。即“相”与方盘的“冬至（一）”叠合，此日气候若有突变，可断其相运为“当者有忧”（参见图三）。其次将圆盘“二”对准方盘九宫上的“春分”时，“相”与方盘中的“立秋”（二）相合，此日气候若有突变，可断其“相”运为“当者死”。以下“太一在秋分之日有变，占在将”、“太一在夏至之日有变，占在百姓”仿此，皆为同一模式的再现。但是“太一在中宫之日有变，占在吏”又应该如何占验呢？通过表二可以类推，“太一在中宫之日”遍布八节各5天，全年累计是40天，具体占法又与其他四宫占有同有异，以下再详作说明。“太一在冬至之日”的第五天时，将圆盘刻有“吏”的位置转至冬至，此日气候若有突变，可断其“吏”运为“当者有忧”（参见图三）。而当“太一在春分之日”的第五天时，将圆盘刻有“吏”的位置转至春分，此日气候若有突变，可断其“吏”运为“当者有喜”（参见图三）^[13]。以下仿此。

需要说明的有四点。其一，既然“太一在中宫之日”是遍布八节各5天，那么其他四宫占就相对少了5天，变成40天，恰好与“太一在中宫之日”等长。其二，“太一在中宫之日”每九日出现一次，而且以全年计算，是以方盘八节之序依次呈现占测结果。而其他四宫占，虽然也有八种占测结果，但不仅限定在各自所属的季节里，而且是以方盘洛书之序依次给出占验结果。足见同为居宫之占，仍有细微差异。其三，上已述及，与中宫之占一样，四宫占的日

数是40日而非46日，此与“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46日，明日居天留46日，明日居仓门46日，……明日居新洛45日”相比似是而非。即“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46日”，是指“太一”从冬至之日起居住叶蛰宫的累计时间；而上述的40日是说“太一”从冬至之日起，在居住叶蛰宫期间占验君运的时间。其他被占测对象皆与此同理。换言之，“太一”与“吏五”（犁）属宗教传统，而“君”与“相”、“将”、“百姓”（百官）、“黎民”（吏十）皆为人间组织，人神两界层次分明，相应的占法亦不可不辨。明确了这一点，便可正确回答前面提到的有关方盘八条占语与圆盘“五宫占”关系的疑问。其四，由于圆盘以九日为一个周期，五个小周期累积起来的话，即为一个周期45日（46日）^[14]。现以冬至46日期间的小周期的第二日为例再作说明。从表二可知，小周期的第二日共有5天，每当此日气候突变之时，其君运皆为“当者死”。这表明“太一在冬至之日有变”虽然是“占在君”，但君运却不是只有与冬至叠合的“当者有忧”。也就是上面演示的那样，每个被占者都有八种占验结果。对于占者来说，把握八节和被占者的身份虽然是前提条件，但更主要的是必须知道占验当日是小周期的第几天，不可笼统以“冬至”、“春分”代替君、相等来推论。有学者根据圆盘“一君”不在冬至之日，却处在夏至和立秋之间，推测占卜对象以“君”自居，其刻度可能提示墓主人死亡时间是在公元前165年六月下旬^[15]。此为不知晓式盘占法而做出的臆测。上已述及，无论何种状态的圆盘，就其指示的时间而言，只能是相当于小周期中的某一天，而大周期又包括了五个小周期，故单从圆盘看不可能具体到某个月份，除非是当事人。准此，以“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46日”为例，可将其占测结果归纳如下：

(1)“占在君”40日，若有气候突变，其占

测结果有八种情形；(2)“占在吏（黎）”5日，若有气候突变，只有“当者有忧”一种占测结果；(3)“废”日1日不占验。

细绎《灵枢·九宫八风》原文，除了上述占法以外，似乎还有一点。其文云：“太一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以其日风雨则吉，岁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则多雨，后之则多汗”^[16]。将此段记载与上文所述比较，或可称为“太一移宫之占”。即“交节过宫之日也。节之前后，必有风雨应之。若当其日而风雨和调则吉，故岁美民安少病也。风雨先期而至，其气有余，故多雨。风雨后期而至，其气不足，故多汗（旱）”^[17]。张介宾在《类经》中的这段中肯论述可作此文注脚。“风雨和调”，即今之所谓风调雨顺。由此可知，太一移宫之占，与上述“五宫占”完全不同，它是以太一初日为中心，包括前后两日，主要是通过观察风雨的有无来预测八节的大致趋势。准确地说，“太一移宫之占”乃是真正的“太一之占”，预测八节气候及年成和民众健康状况的大致趋势；而“五宫占”则是指其日气候突变时，推算被占测者的个人命运如何。

四、圆盘刻度的设计

关于式盘占法，在前文按“太一、九宫、观测者”这一排列顺序，对“五宫占”进行了全面演示。结果表明，被占者虽然依地位之高低，配数及所属季节亦不同，但均与九宫八方盘中洛书之序相合，从而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对式盘占法复原的可信性。但是很难想像，古人会把圆盘、方盘分别举过头顶来占验。实际上，古人是在符合这种位置关系的基础上，选择最容易操作的方式进行的。即方盘位置不变，将圆盘正面朝下，观测者却没有必要一定处在方盘之下，只需要正常目视即可；然后依圆盘上洛书之序，分别转至方盘上八节。方盘的设计，当然是以八节、八方配九宫洛书而成，但是古人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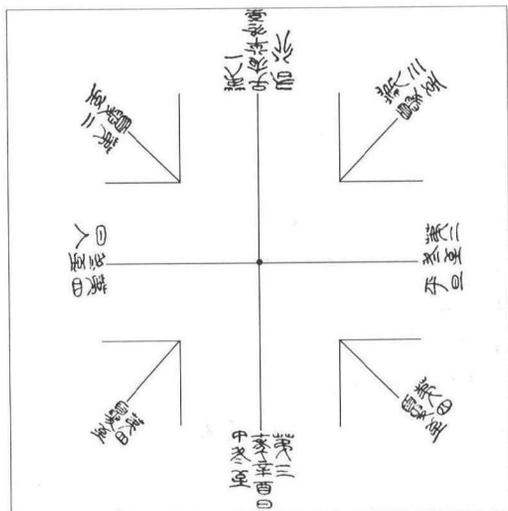
什么，具体又是如何创制圆盘的，却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复原刻度的设计有三个前提。其一，最初的圆盘应该是空白的；其二，圆盘的正面朝下；其三，方盘洛书已经完成。具体做法如下。第一，在圆心处，钻刻一个与方盘中央圆孔等大的圆孔。此为固定方盘、圆盘之孔。第二，刻一个比圆盘孔略大的同心圆，以示中宫。第三，将圆盘八等分，但内侧端点至中宫外侧边缘为止，不入中宫内部；八等分外侧端点至圆盘外周边缘留出一定空白，以便刻写“一君”、“三相”、“七将”、“九百姓”9字。第四，取八等分的任意一个端点，作为“君”的点位，并配数字“一”。其中数字“一”刻在八等分线端点，“君”刻在“一”和圆盘外周之间，并以此为起点。第五，按九宫方盘洛书从一（冬至）至九（夏至）之序，旋转圆盘并使“一”君依次与之叠合。每当“一君”与方盘洛书叠合之时，便在与方盘冬至相对应的圆盘位置上，依次标记从二至九的数字，其中，五以“吏”替代，刻于三、四之间。第六，由于三配相、七配将、九配百姓，故“相”、“将”、“百姓”仿照一配君的做法。第七，由于中宫的“招摇”被“吏”取代，故“吏”之后应刻“招摇也”三字。考虑到判读方便及盘面设计上的谐调，“招摇也”三字，按右旋方向均等分配。

应该说明的是，“一君”设计好了以后，其他被占测对象，只要与相对应的数字匹配，便会出现与“一君”完全相同的现象。即不管被占测的对象是三（相）也好，七（将）、九（百姓）也罢，当圆盘按其刻度从一至九的顺序，依次旋转并与相应季节叠合的时候，被占测的对象恰好是与方盘洛书之序叠合。事实上，一旦“一君”的模式建立起来，只要确定被占测对象，不仅四正宫占，其他四维宫占同样可以建立起来。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一是重视五方，二是被占

测的对象是在人间，而当时的人间组织又是以“君”、“相”、“将”、“百姓”（百官）、吏（黎民）等来分类的缘故。

式盘制作时是按照“太一、九宫、观测者”这一排列顺序为前提的，九宫方盘自然就在圆盘之下。为了表现最为重要的太一，既要避免旋转时太一视角上的缭乱感觉，又要能够体现太一行九宫的传统理念，于是太一的化身便被设计成圆形。九宫在天上，本来也应该呈现圆形，但现在是太一的化身已被设计成圆形。一方面可能出于外观上的谐调，于是本也应该呈现圆形的九宫盘就变成了方形。另一方面，九宫盘的主要作用是提示八方与八节、九宫的匹配关系，而方形恰好在兼顾表示八节、九宫的同时，又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八方的意义，这一点可以通过方盘背面（图四）的提示，得到准确的验证^[18]。需要说明的是，学术界习惯将方盘称为地盘似有可商之处。因为虽然方盘中的八节及方位与洛书完全一致，这一点可从《灵枢》九宫八风洛书图中得到确证（参见图一），但方盘中也刻有九宫之名，而式盘的主要用途又恰恰是太一下九宫之占法。既然九宫在天上，以地盘名之显然不妥。考虑



图四 西汉九宫方盘背面
（采自《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
《文物》1978年第8期）

到九宫和八方也是相互联系，故应以九宫八方盘为名，或简称九宫盘，或按外形称方盘与太一圆盘正相对。准确地说，方盘中的八节及八宫名，就是圆盘旋转时的刻度，而圆盘上的洛书，既是太一下九宫游走顺序的标识，又与方盘八节、九宫呼应，即方盘、圆盘是一体的。不得不承认，这种设计是极富智慧的。最后必须强调，圆盘刻度的设计过程，是揭示整个式盘底蕴的关键问题，当然也是无法回避的原则问题。如果我们复原圆盘刻度的设计过程是客观的，那么，就不得不重新思考式盘的使用方法，并且必须将其与具体占法相结合。

五、有关“百姓”、“吏”的思考

关于“五官占”及相关诸问题，已如上述。下面围绕被占测者中“百姓”、“吏”的含义，略作探讨。

范文澜先生认为，“百姓”一词由表示百官贵族之义演变为表示平民之义，是在春秋后半期^[19]。徐朝华先生也认为，在春秋中期以前，百姓是奴隶主贵族的通称，多指百官。春秋后期起，百姓开始转变为表示民众的意思。到战国时期，百姓几乎完全是表示民众的意思^[20]。那么，对《黄帝内经》中的“百姓”又应该作如何理解呢？“百姓”一词，在《黄帝内经》中凡见八例，具体情况如下。

(1)《灵枢·九针十二原》云：“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21]。学者或认为“子万民”为意动用，即以万民为子^[22]，此论似可商。因为在这里“子万民”与“养百姓”对应，“子”当为“养”的近义词。《礼记·中庸》云：“子庶民也，来百官也”，郑玄注：“子，犹爱也”^[23]，故“子万民”之“子”当训为爱。换言之，此文例之“百姓”对“万民”，与《礼记·中庸》“百官”对“庶民”酷似，显然与今日所谓“百姓”灿然有别。

(2)《灵枢·师传》云：“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这里的“民”与“身”相对，似乎无法断定“百姓”的确切含义。但该篇又云“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这里“百姓”与“人民”对举，可证此文例中“百姓”亦非今日所谓“百姓”。

(3)《素问·天元纪大论》云：“余愿闻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此文应是袭自《灵枢·师传》。

(4)《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帝曰：余念其痛，心为之乱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闻之，以为残贼，为之奈何？”^[24]这里“百姓”是否与今日之“百姓”不同，尚不能肯定。但该篇起始一段有“君王、众庶”一词，可知“百姓”与“众庶”所指非一。至此可得初步印象，即《黄帝内经》中“百姓”一词与今日所谓“百姓”不同。学者多以为即百官^[25]，可从。

(5)《灵枢·五变》云：“少俞曰：夫天之生风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无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也”。

(6)《灵枢·行针》云：“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九针于夫子，而行于百姓，百姓之血气各不同形……”。

文例(5)、(6)中的“百姓”，由于缺乏比较的资料，不易判断其确切含义。但是从文例(5)中“百姓”下“其行公平正直”之语来看，似乎也与百官有关。从文例(6)与“九针”关联来看，可能与前述文例(1)的用法如出一辙。

(7)《灵枢·官能》云：“用针之

服，必有法则，上视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观百姓，审于虚实，无犯其邪”。

(8)《灵枢·九宫八风》云：“太一在夏至之日有变，占在百姓”。

文例(7)所云，在《素问·八正神明论》被理解为“用针之服，必有法则焉”，“合以天光”，“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唐人杨上善《太素·知官能》注云：“须上法日月星辰之光，下司八节正风之气”^[26]。实际上“上视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观百姓”，正可与《灵枢·九宫八风》及式盘两者对读。“上视天光”在后两者之中就是指北斗(招摇)。“下司八正，以辟奇邪”与后两者的八节、八方及《灵枢·九宫八风》的八风一致，即《史记·天官书》所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而观百姓”与式盘圆盘中的“九·百姓”及文例(8)吻合。由此可知，《灵枢·官能》与《灵枢·九宫八风》一样，为早期占法之存留，是一篇十分珍贵的文献。通过上述论证，可知《黄帝内经》中“百姓”一词，很可能是指百官，而不是今天所谓“百姓”。从《黄帝内经》中“百姓”具有的意义来看，至少与此相关的篇章内容，或许是战国以前之子遗，值得进一步研究。

“君”、“相”、“将”、“百姓”的内涵既已明确，那么“吏”的意义到底如何来界定呢？曾有学者根据“‘事’、‘吏’古本一字，故‘吏’殆事务官”，以及秦汉所谓的“吏”主要是指“从事刀笔文案方面的工作”的说法，训“替身中宫”的“吏”为“从事刀笔文案方面工作”的“事务官”，正应沟通“君、民”和“将、相”之间旨意，合于中宫之配^[27]。但是，冯时先生提出，如同《礼记·月令》中央五取生数为配，四方四时取成数为配这一失谐一样，在九宫体系中，配数五且象征中央的“吏”与表示四方的北君、东相、西将、南百姓共配

五方也显示出同样的失谐和矛盾。如果说上君、左相、右将、下百姓的格局反映了现实社会特有的君臣之位的话，那么“吏”为治民之官居于中央，不仅与作为臣僚的相、将重复，而且也与君位相冲突。很明显，“吏”与君、相、将、百姓分别出于不同系统的事实应该很清楚。“吏”何以能具有象征中宫五的条件，实应源于君、臣、百姓所代表的人间社会不同的宗教传统。太一九宫式盘的中央书有“吏招摇也”四字，即是对中宫吏出于神祇的明确说明。并根据招摇与北斗、天帝及社配天帝、太一而居中认为，“吏”的本质其实就是社神后土。又以后土称犁的古代文献，推测“吏”实际是来源于“犁”^[28]。这种独辟蹊径的探索，极富启发性。但是，从“五官占”来看，“太一在中宫之日”是每九日出现一次，并且遍布八节，故其占测结果是“八节八样”，贯通全年。如果上文所复原“太一在中宫之日”的占法正确的话，很显然“吏”亦是人间组织的一部分，而不应该属宗教传统^[29]。除了上面的证据以外，我们还注意到所谓“五官占”与数字配属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君一、相三、将七、百官九，即人间组织的地位高低与数量正成反比关系。这些现象启发了我们，中宫的“吏”，除了具有社神后土的意义以外，很可能还是“黎民”的象征，其理由如下。(1)冯时以为，“犁”的上古音为来纽脂部字，“吏”为来纽之部字，声为双声，之脂二部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同音可通^[30]。而“黎”与“犁”的上古音完全相同。(2)“吏”居中宫，不仅与“五”匹配，也与“十”联系。君一、相三、将七、百官九、黎民十，不仅比例合理，彼此之间不相重叠；而且又有以“天数”配官位，以“地数”配黎民，分别贵贱之意图。(3)“吏”配“十”的话，“五”便空缺出来，如冯时所言，因为中央“五”是来自神圣又不可僭越的古老的宗教传统。这似乎提示

“吏”有双重效果，即一方面与“犁”通配“五”代“招摇”，属神祇体系，它不涉及具体的个人占验，此为保持宗教传统理念之作；另一方面与“黎”通配“十”，表示“黎民”而有占验。需要说明的是，一个“吏”字不可能既在三、四之间，又在九之后，而且四之后又不允许中断，故排在三、四之间，乃不得已为之。“占在吏”本应将圆盘旋转至“十”的位置，但式盘中的“十”与“五”是相互叠合的。换言之，“占在吏”的配数虽然是“十”，但由于“十”与“五”的方位重叠，所以也可以说“太一在中宫之日有变，占在吏”。这一点与式盘的“废”字虽为第十日，但实际运作时相当于第五日的位置是一个道理。还需强调，“太一在中宫之日有变，占在吏”的“中宫”，与其他四宫占，如“太一在春分之日有变，占在相”的“春分”这一书写体例并不一致。原因在于与“中宫”相配的季节其实并不存在^[31]。这种官僚配相应季节，而黎民没有固定所属季节的情况，亦有重官轻民思想。事实上，只要承认“太一之占”是预测八节气候及年成和民众健康状况的大致趋势，“五官占”中就没有理由完全忽视“民”的一席之地，这一点恰可佐证我们对“吏”占的分析。可见，除了“废”日以外，每天都可以占验，占测对象是上为君，中有相、将、百官，下至黎民。如果参照帝庭^[32]格局，“太一”当独居璇玑，相当于“天帝”（招摇）；“吏五”（社神）亦居中，但置于“太一”之下，相当于“帝工”。“帝工”与四神处于同一层面，而这里的“君”、“相”、“将”、“百姓”又恰好与四方配属。即便是君权神授，将“君”纳入到与“帝工”（吏五）同一层次可以理解，但将“相”、“将”、“百姓”也纳入到同一层次，就显得极不和谐。准此，人间组织的“君”、“相”、“将”、“百姓”分布四方，当在“帝工”（吏五）之下；而“吏十”

（黎民）居中，虽与“太一”及“帝工”不符，但从其空间格局来考虑，当在配天数的“君”、“相”、“将”、“百姓”之下或地下，与地数“十”正相配合。如此则各方面矛盾不仅迎刃而解，而且也可反证式盘的“百姓”并非黎民，乃是百官无疑。人神两界在高下之中，再分高下，层次鲜明，式盘占法的原貌及被占测对象的内在含义，可以得到圆满解释。上面所说“吏为治民之官居于中央，不仅与作为臣僚的相、将重复，而且也与君位相冲突”这一疑惑，由此可以得到解消。

六、余 论

方盘本来应该刻有洛书，为何不见踪影呢？通过上文的论述，对这一现象已经很容易解释。由于圆盘的刻度是以方盘洛书之序刻绘，也可以说就是方盘洛书的翻版，故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两者既然完全一样，况且方盘中的八节和九宫本身也与洛书相互联系，而圆盘刻度又不可或缺，当然只能是简省方盘中的洛书。如果我们的推测正确，那么在实际制作的时候，洛书肯定不会刻于方盘之上，而应该是以记号的形式标识，当整个式盘完成之后，再去掉标识。当然，如果视洛书与八节、九宫为一体，彼此联系可以互相表示的话，方盘不以记号的形式标识洛书，其效果同样完美。

或有疑问，圆盘刻度正面朝下与方盘相对的话，实际操作岂非既不容易掌握，也容易出差错？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占者只要在与圆盘刻度“一”这一位置相对应的背面或侧面做好记号，并记住洛书的分配方位及三配相、七配将、九配百姓、十配黎（相当于“吏”的位置），就能够十分娴熟地操作这件式盘了。

那么为何中宫“招摇”要被替换，替换者又非“吏”莫属呢？第一，“招摇”作为“太一”的象征，本居天上，但是当式盘中“君”、“相”、“将”、“百姓”作为被占测

注 释

的人间组织登场的时候，出于盘面协调，位居中央的神祇，就应该从天神改为地神，于是式盘的设计者想到了与“吏”相通的后土“犁”（五）。第二，由于“太一占”能够占测国计民生的基本状况，这使得在式盘被占测者名单中不得不保留“黎民”的席位，于是除了分布四方的官位以外，“吏”又兼有暗喻“黎民”的意义。由于“十”为成数之最，与为数众多的“黎民”匹配正相合。第三，“吏，招摇也”只用来说明“吏”和“招摇”的关系而已，而“吏”一身两用以及“吏”居中宫的问题，可据分配空间层次的不同得到妥善处理等，这已在前文中论及。概而言之，如果我们承认，“当者有忧”，特别是“当者病”、“当者有盗争”等，不能适用于社神“犁”（吏），就不得不考虑，“吏”除了象征后土“犁”（五）以外，还应兼有“黎民”（十）的意义。

通过复原《灵枢·九宫八风》及式盘中有关“五官占”的具体占法，揭示了以往有关式盘使用方法研究中的重大疏漏，即在将圆盘正面朝下的前提下，旋转了圆盘。同时也可以看出，实际占测的时候，除了占测者以及局内人，其占测方法并不被人知晓。理由很简单，圆盘的正面朝下，人们并不知道圆盘的正面写了些什么。当占盘的所有者作古的时候，人们将式盘作为陪葬品下葬，或许为了秘而不宣，故意将圆盘正面向上。也或者是治丧者并不知晓式盘的使用方法，而且式盘不用的时候很可能刻度面向上的缘故，于是圆盘便以正面朝上的姿态呈现在今天的发现者面前。这一简单的错位，竟使今人始终捉摸不透这小盘中所蕴藏的玄机。如果没有《灵枢·九宫八风》这篇传世文献，我们恐怕还是无法解读这件式盘并对其学术价值作出公允的评价。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有很大的互补性，要想正确、全面地探讨相关学术问题，两者的系统比较、相互参证的方法不可或缺。

- [1] 顾颉刚、杨向奎：《古史辨》第7册中编第268页，太平书局，1963年。
- [2]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 [3] a.同[2]。
b.严敦杰：《关于西汉初期的式盘和占盘》，《考古》1978年第5期。
c.殷涤非：《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占盘和天文仪器》，《考古》1978年第5期。
d.蔡运章：《甲骨文文与古史研究》第318~35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e.李学勤：《古文献论丛》第235~243页，远东出版社，1996年。
f.孙基然：《西汉汝阴侯墓所出太一九宫式盘相关问题的研究》，《考古》2009年第6期。
- [4] 同[3]b。
- [5] 同[3]b。
- [6] 同[3]c。
- [7] 同[3]e。
- [8]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第103、104页，东方出版社，2001年。
- [9] 同[3]f。
- [10] 孙基然：《〈灵枢·九宫八风〉考释》，《辽宁中医杂志》2012年第4期。
- [11]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第3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2] 圆盘刻度的设计过程，参见本文的详细讨论。
- [13] 有学者认为，方盘中“当者喜”之类与正风对应，而“当者忧”之类与虚风对应，可参见注[3]d第358页。笔者认为此说甚误。《灵枢》在“五官占”之后明言：“所谓变者，太一居五官之日，病风折树木，扬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贵贱”，乃虚风无可疑问。
- [14] 孙基然：《〈灵枢·九宫八风〉“大、小周期”考辨》，《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0年第6期。
- [15] 参见注[3]d第359页。但问题的关键是，此种推测没有提出墓主人以“君”自居的可靠证据。据简报介绍，式盘出土时，“君”正指立秋，而立秋的占验结果恰好是“当者

死”。但是通过我们的复原可知，一年之中“君”位与西南（立秋）方位相合的次数是40天，即便是限定在八节中的某一节之内，也还是有5天完全一样，所以仅据“君”之指向与立秋的关系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另外，方盘背面的有关所谓“冬至”、“夏至”（参见图四）的铭文，仅仅是校订四分历的记录结果而已（参见注[3]b），也与墓主人死亡时间无涉。事实上，从式盘除了“废”日以外，每天都必须旋转这一特征来考虑的话，圆盘所在的位置，很有可能提示了占者的死亡时间。如果直至占者死亡那天为止，圆盘没有每日旋转的话，则另当别论。但是，在没有其他旁证的前提下，还是无法断定占者的具体死亡时间。

- [16] “汗”，日本仁和寺藏版《太素》作“旱”。参见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下）第301页，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81年。
- [17] 张介宾：《类经》第982页，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
- [18] 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修订版）第42~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 [19]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
- [20] 徐朝华：《上古汉语词汇史》第84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 [21] 《新刊黄帝内经灵枢》第15页，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年。本文涉及《灵枢》的文献皆引自此书。
- [22] 李书田：《〈黄帝内经〉中“百姓”含义考》，《中华医史杂志》2005年第3期。
- [23]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第16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 [24] 《重雕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上）第349页，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年。本文涉及《素问》的文献皆引自此书。
- [25] 同[22]。
- [26] 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中）第366页，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81年。
- [27] 同[3]f。
- [28] 冯时：《〈周易〉乾坤卦爻辞研究》，《中国文化》2010年第2期。
- [29] 尽管社神亦主生死，但如“当者死”、“当者有忧”，特别是“当者病”、“当者有盗争”等，很显然不能适用于社神“犁”（吏）本身，况且社神的“犁”（吏），如同“太一之占”，可以预测八节气候及年成和民众健康状况的大致趋势，与“五宫占”推算被占测者的个人命运层次迥异。
- [30] 同[28]。
- [31] 同[3]f。
- [32] 关于“帝庭”，参见注[18]第89~96页。（责任编辑 杨 晖）

○信息与交流

《广西田东么会洞早更新世遗址》简介

《广西田东么会洞早更新世遗址》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博物馆编著，科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发行。该书为16开精装本，正文共170页，约28.4万字，文后附有彩色图版19页。定价180元。

本书对广西田东布兵盆地么会洞遗址新发现的早更新世人类化石、古猿化石（新种）、巨猿化石、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以及

时代可能稍晚的石制品进行了综合研究。么会洞遗址所提供的层位清楚、时代可靠和特征明显的化石证据，将对早期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理论的建立提供新的重要依据。本书可供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生物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地质学等学科的学者参考、阅读。

（文 耀）

本期要览

郑州市西史赵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 2011年对郑州市庙李镇西史赵村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遗址 I 区发现了丰富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墓葬等,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以及少量骨器、蚌器等。该遗址的发掘,进一步丰富了郑州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秦王寨文化类型的内涵,同时也为聚落群之间布局与结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乌鲁木齐市鱼儿沟遗址与阿拉沟墓地 2008年对乌鲁木齐市鱼儿沟遗址北区进行了发掘,发现石墙、房址、岩画等遗迹。另在相距不远的阿拉沟内清理了3座被盗墓葬。出土遗物包括陶器、铜器、铁器、木器以及动物、植物遗骸。遗址及墓葬的年代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次发掘对研究鱼儿沟地区的古代文化面貌、探讨新疆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辽宁抚顺市刘尔屯汉魏墓群的发掘 2008年,在抚顺市刘尔屯墓地抢救性发掘了21座墓葬,包括砖椁墓、砖室墓、瓦棺墓、瓮棺墓等不同形制。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还有少量筒瓦、铜钱等。墓葬的年代属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和东汉末至曹魏两个时间段。此次发掘为研究本地区中下层居民墓葬的发展和演变,及其与中原地区文化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山东北部晚商西周煮盐作坊的选址与生产组织 根据山东北部地区盐业考古专题调查的结果,可揭示煮盐作坊遗址的聚落形态及分布规律,晚商及西周时期作坊在选址时倾向于“夹子”与湖沼地貌。进一步探讨晚商及西周时期煮盐作坊的生产组织与社会属性,可以推断此时期的盐业生产属于小规模私营行为的组合体,这使得煮盐作坊的选址严重受限于自然资源。

西汉太一九宫式盘占法及相关问题 根据西汉汝阴侯墓出土太一九宫式盘的铭文,结合《灵枢·九宫八风》中涉及“太一占”和“五宫占”的记载,可复原圆盘刻度的制作过程。判断太一九宫式盘使用方法正确与否,关键要在各种占测过程中得到合理验证。式盘铭文中的“百姓”可能指“百官”;“吏”既体现出后土“犁”这一宗教传统,也兼喻“黎民”。